

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辅导材料

《毛泽东八篇著作哲学思想简介和简要注释》

《毛泽东八篇著作问题解答》

《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上、下）

教学研究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理论研究室 1982.12.

教学研究

JIAOXUEYANJIU

毛泽东八篇著作
哲学思想简介和简要注释
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辅导材料之一

4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理论研究室 1982

目 录

第一部分 各篇哲学思想简介

《实践论》	(1)
《矛盾论》	(4)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7)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9)
《论持久战》	(11)
《战争和战略问题》	(14)
《新民主主义论》	(16)
《论联合政府》	(18)

第二部分 简 要 注 释

《实 践 论》

1.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	(21)
2. 社会实践.....	(21)
3. 规律.....	(21)
4. 认识论.....	(22)
5. 感觉.....	(22)
6. 印象.....	(22)
7. 概念.....	(22)
8. 判断.....	(22)
9. 推理.....	(23)
10. 感性认识.....	(23)
11. 理性认识.....	(23)
12. 真理.....	(23)
13. 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	(23)

《矛 盾 论》

14. 矛盾.....	(24)
15. 对立统一法则.....	(24)
16. 唯物辩证法.....	(24)

第一部分：哲学思想简介

《实践论》简介

《实践论》是一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著作，是毛泽东同志哲学思想的重要代表作。

《实践论》写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当时我国处于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转入抗日战争的历史转折关头。这时，我们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已有十六年的历史，经历了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的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曾经犯过右的和“左”的错误。特别是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看轻实践，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同时，在我们党内也存在着把局部经验当成普遍真理的经验主义倾向。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是主观主义，都是以主观同客观相分裂、理论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实践论》是为了清算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清算教条主义而写的。它从认识论的高度科学地总结了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深刻地、系统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想，为全党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贯穿全书的中心思想是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必须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一、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认识的源泉、动力、目的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

关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列宁曾经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列宁的思想，明确地指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人的认识一点也离不开实践。首先，论述了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一切知识，不论是直接经验还是间接经验，归根到底都是来源于实践。其次，论述了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是社会实践推动着人的认识向前发展。第三，论述了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判断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第四，论述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人们取得正确认识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于实践，正确的理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够指导人们正确地进行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二、以社会实践为基础，考察了实践和认识的矛盾运动，论述了正确认识的形成和发展，揭示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法。

列宁曾经明确指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

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发挥了列宁这个思想，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

人们的认识运动，首先是由实践到认识的过程。就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实现认识的第一次飞跃。感性认识是对客观事物的直接认识，它反映的是事物的现象和外部联系，是认识的低级阶段；理性认识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借助于抽象的思维，对客观事物的间接认识，它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是认识的高级阶段。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两个认识阶段，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取得理性认识，这是认识论的唯物论；感性认识有待于深化，经过思考的作用，把丰富的感性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发展为理性认识，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是认识论的辩证法。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认识根源，是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割裂开来，各自抓住一个片面。教条主义轻视直接经验的作用，一切从“本本”出发，在认识论上陷入唯心主义；经验主义忽视理论的重要指导作用，在认识论上导致形而上学。

人的认识运动，实现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第一次飞跃，认识过程并没有完成，还必须从理性认识回到实践中去，实现认识的第二次飞跃。这一次飞跃比前一次飞跃更加重要。这是因为理性认识只有回到实践中去，才能得到检验和发展，才能发挥指导人们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两次飞跃，如果达到了预期目的，证明认识是正确的，作为一个具体的认识过程就完成了。

人们的认识运动，又是一个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无限发展的辩证过程。由于人的认识常常受着许多条件的限制，所以在许多时候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取得正确认识。客观世界又是无限发展的，所以人们的认识也就永远不会完结。“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高一级的程度。”深刻地揭示了人类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和总规律。

三、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系统地论述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要求，是《实践论》的中心思想。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总是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所谓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就是主观认识符合客观事物的实际情况，这种统一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静止的而是发展的。是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运动过程中的统一。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过程。

这个“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思想，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们党十多年的历 史经验，分析左右倾错误思想的共同特征以后作出的科学结论。他明确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理论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就是说，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都不了解认识要随着事物的发展而发展，

他们的思想或者是僵化，落后于实际，犯右的错误；或者是把幻想当成真理，超越现实，犯左的错误。为了纠正和防止右的或左的错误，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的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要达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必须解决好改造客观世界同改造主观世界的关系。改造客观世界同改造主观世界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主观世界，才能使主观符合不断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达到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

《实践论》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认识论基础。我们党按照《实践论》办事，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同群众路线统一起来，坚持调查研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创造了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后来，我们犯了左倾错误，其重要原因是违背了《实践论》的原理。粉碎“四人帮”以后，“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仍然是违背了《实践论》。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以《实践论》为武器，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这场斗争的胜利，在全党恢复和重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依靠《实践论》的指导，我们完成了拨乱反正是历史任务。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崭新的事业，我国的国情比较特殊而复杂。我们党遵循《实践论》的思想，着重研究我国的国情，总结实践经验，确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和国民经济建设的方针。《实践论》告诉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永远不会完结，我们必须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史 方)

《矛盾论》简介

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同志为了从世界观的高度总结建党十六年来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克服党内存在的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继《实践论》之后又写了《矛盾论》这一光辉著作。

《矛盾论》是毛泽东同志论述唯物辩证法的一篇最重要的著作。它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特别着重地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以及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相互关系的原理，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阐明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基本原则，深刻地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思想理论根源，从而为我们党确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几十年来，《矛盾论》一直是我们学习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教材，反对形而上学思想的尖锐武器，在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上发生了十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矛盾论》主要论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宇宙观。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是外力推动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则与此根本对立，是用联系的、发展的和全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认为事物的内部矛盾即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把事物的发展看作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一事物和它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即外因则是事物发展的必要条件。按照这种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主要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唯物辩证法把外因看作事物发展的必要条件，因而它并不排斥外因的作用，同时又认为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就科学地揭示了内因和外因的关系。这一原理告诉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必须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但在任何情况下也不排斥外因的作用，都要积极地利用和争取外援，把自己的事业办得更好。

二、不仅要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尤其重要的是要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

毛泽东同志论述了矛盾普遍性的两个含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矛盾是无处不

有，无时不在的，它普遍地存在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各个领域中，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又是各个特殊的，每一事物的矛盾及矛盾的每一侧面都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认识矛盾的普遍性，才能找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原因或普遍根据；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才能确定这一事物不同于其他事物的特殊本质，从而正确辨别事物。毛泽东同志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中，指明了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的重要性在于，对不同质的矛盾必须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同志详尽地阐述了分析矛盾特殊性的五种情形，即各个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的特殊性；各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的特殊性；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的各个方面的特殊性；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矛盾的特殊性；各个发展阶段的矛盾的各个方面的特殊性。只有这样，既研究事物在运动发展中各个过程和阶段的矛盾的特殊性，又研究事物矛盾各个侧面及其相互关系的特殊性，具体地分析具体的矛盾，才能避免主观随意性，客观地、全面地、深入地认识事物的本质，找到正确解决矛盾的方法。

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相互联结的，它们是任何一个矛盾所具有的两重属性。每一个事物的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一切事物和过程都是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这是共性，是无条件的，因而是绝对的；然而，共性就存在于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的、暂时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断，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它是我们党坚持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基本原则的理论基础。

三、研究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的问题，是分析矛盾特殊性的继续。

在由诸矛盾组成的复杂事物中，其中必有一个是主要矛盾，它对事物的发展起着主要的、领导的、决定的作用。而其他的矛盾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这就是非主要矛盾。抓住了主要矛盾就能认识事物的本质，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这就要求我们在观察处理问题时，要注意抓主要矛盾。而非主要矛盾对主要矛盾也有影响和制约作用，解决好非主要矛盾可以为主要矛盾的解决创造条件，因此又要求我们在用主要力量解决主要矛盾的同时，注意相应地解决一些非主要矛盾，以促进主要矛盾的解决。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这就要求我们及时地转移自己工作的中心。这是我们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理论根据。

矛盾双方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其中居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的方面是主要的矛盾方面，另一方则是非主要的矛盾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规定的。”因此，认识事物必须分清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分清主流和支流，要避免主次不分，或主次颠倒。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这种转化决定于矛盾双方力量的增减程度。当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发展到双方主次地位发生转化的时候，事物的性质就随之发生变化。

四、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研究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研究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的进一步深入和展

开。事物的矛盾双方既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具有同一性，又相互排斥具有斗争性。所谓矛盾的同一性，一方面是说矛盾着的双方各以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另一方是说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矛盾的同一性说明矛盾双方是密切联系的，双方的关系不是僵死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可变动的。一定的条件是矛盾双方依存和转化的基础和前提。所谓矛盾的斗争性，是指矛盾着的双方的相互对立、相互排斥和相互否定。矛盾的斗争普遍地存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各个领域。矛盾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对抗性和非对抗性之分。一般地说，对抗性矛盾采取对抗的斗争形式才能解决，非对抗性矛盾则用非对抗性的斗争形式去解决。只有正确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不同的斗争形式，才能正确地处理和解决各种矛盾。

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与斗争性也是相互联结的，是同一矛盾的两重属性。矛盾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因而是绝对的。相对的同一性中包含着绝对的斗争性，绝对的斗争性存在于相对的同一性之中。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与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矛盾着的对立而又统一又斗争，推动了一切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只有深入研究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才能深入地认识矛盾和正确地解决矛盾，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辩证关系原理，是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理论基础，也是党内坚持“团结——批评——团结”这一正确方针的理论依据。

《矛盾论》曾经指导我们党正确认识中国极其复杂和特殊的国情，制定了符合中国特点的政策和策略。后来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一个重要原因是违背了《矛盾论》的基本思想，搞了许多形而上学的东西，把一定条件下的成功经验绝对化，把真理弄过了头。至今学习辩证法，克服片面性，仍然是各级干部端正思想路线的重要课题。我们既要纠正过去左的片面性，又要防止任何新形式的片面性。不能因为有人曲解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否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指导作用；不能因为曾经片面强调了斗争性，就否认一切必要的和正确的斗争；不能因为犯过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就否认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的阶级斗争；不能因为过去片面夸大精神作用，就否认人的正确的主观能动性，否认建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大意义，如此等等。为此，必须认真学习、研究《矛盾论》这部伟大著作。

(齐 戎)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哲学思想简介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经典，它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成熟，是《实践论》、《矛盾论》的先导，两论中许多精华思想在这篇著作里，已结合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相当系统地提出来了。因此它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

毛泽东同志的这篇著作是为着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写的，是当时党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同志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提出了许多光辉的军事思想，指导全党、全军粉碎了蒋介石的“围剿”，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但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反对毛泽东同志正确的军事思想，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继而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又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地解决了党的军事路线问题。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军事领域，从认识论的高度系统地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并在此基础上为中国革命战争制定了一整套战略战术原则。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实质上是两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同时，也总结了两条根本对立的认识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从根本上划清了两者的界限。这部著作中的主要哲学思想大体可归纳为以下六点：

一、坚持唯物史观，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战争现象的产生、性质和消灭进行了深刻分析，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基本思想。

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它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灭；战争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我们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我们共产党人研究战争规律的目的是为了消灭战争。

二、研究战争的指导规律必须注重战争的客观规律，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通篇是讲的关于战争规律的问题。尽管战争和其他社会现象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复杂性，但是也有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指出，战争的客观规律和人们的主观认识之间是有矛盾的，主观认识不符合客观规律就会犯错误、打败仗。若防止错误，多打胜仗，“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更重要的是还要根据战争的时间、地域和性质的不同，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毛泽东同志说：“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

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他把这些思想概括为：研究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关系，就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这个思想后来在《矛盾论》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三、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应用于战争。

首先，毛泽东同志强调战争实践是认识战争的基础。他说：“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这个方法体现了实践第一的观点。其次，毛泽东同志对战争指挥员认识的深化运动作了完整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法。他科学地提出并系统地论述了认识过程两个飞跃的思想。他说，指挥员的正确部署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他又说，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即实行计划的过程。这些思想后来在《实践论》中由军事形态升华为哲学概括和论证。

四、深刻论述了全局和局部的辩证法。

全局和局部是对立的统一。首先，全局统帅局部，决定局部；而局部隶属全局，不能脱离全局而孤立存在。只有懂得了全局才能自觉地坚持全局观点，使局部服从全局。其次，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要掌握全局，又必须了解局部。第三，局部和全局也是相对的。世界可以是一全局，一国可以是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一全局。第四，由于事物发展诸方面不平衡性，各个局部在全局中地位并不一样，有的局部可以对全局有决定的影响。因此，领导者要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这是一个重要的领导方法。

五、提出了在客观物质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指导能力的思想。

毛泽东同志首先肯定战争胜负主要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反对脱离实际，不顾客观条件的鲁莽家。同时，也反对消极等待的唯条件论。他说：“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话剧来。”这一思想是唯物论与辩证法的高度的统一。它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极度艰难的条件下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六、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是辩证法的光辉范例。

毛泽东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及为实现这一方针的一系列作战原则和方法。首先，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是中国革命战争根本规律在战争指导上的正确反映，是劣势军队对于优势军队所采取的唯一正确的战略方针。同时也是充分发挥主观指导能力的生动体现。其次，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深刻揭示了敌我双方矛盾运动的本质联系，揭示了防御和进攻，得和失，集中和分散，内线和外线，持久和速决之间相反相成、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辩证法，是毛泽东同志对军事辩证法的伟大贡献。

总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它向我们“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

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哲学思想，指导四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方法论的意义。它告诉我们在四化建设中，尽管情况复杂，总是有客观规律可循的。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的现代化建设的规律，尤其要研究特殊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

律。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从中国国情出发，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充分发挥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从实践中，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四化建设道路。在四化建设实践中，正确处理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正确认识优势和劣势、前进和后退、长远和眼前、集中和分散、独立自主和争取外援等等的辩证关系。一句话，就是要认真研究规律，按规律办事。

(孟金山)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哲学思想简介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推动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由于国共两党的抗战指导路线根本不同，在两个战场上出现了绝然相反的局面：在国民党的战场上，由于他们实行一条单纯防御、不敢发动群众的片面抗战路线，因此在日寇进攻面前大都丧失了战斗力，造成正面战场大溃退，广大国土沦为敌人的后方。在我党的人民抗战路线指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所担负的战场，却节节胜利，我军在华北、华中和敌人后方的广大区域内，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狠狠地打击了日寇的侵略气焰。面对这种形势，党内外许多人对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战略作用估计不足，对抗日游击战争的前途持怀疑态度，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正规战争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上。他们只看到数十万久经训练的国民党正规军都不能抵挡日寇的进攻，就以为由人民群众组织起来的游击队也不能战胜猖狂的日本侵略军。因此，能否回答和解决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成了关系我党我军的发展壮大、抗日战争胜利和中国前途的大问题。为此，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

在这篇光辉著作中，毛泽东同志根据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地分析了抗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特点，对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争进行了详尽的考察，精辟地阐明了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的战略作用，为抗日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为根据地的发展、巩固和壮大，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和正确的道路。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不仅是一部光辉的军事著作，而且也是一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它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精辟分析，处处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光辉，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适时地实行战略转变。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革命由国内战争转变为民族解放战争。随着这个转变，党的军事战略也必将发生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相应转变。可是，我们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过份相信国民党的力量，把抗日战争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军队的正规战上，反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原则，否认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的必要

性。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地分析了中日战争双方的具体情况，精辟地说明了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他深刻指出，在抗日战争中，正规战争是主要的，但由于敌我矛盾的基本特点所决定，游击战争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必须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的地位加以考察。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必然出现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和战争的长期性。随着敌人占地甚广现象的发生，就使敌人不得不因兵力不足而在占领区留下很多空虚的地方，这样就使抗日游击战争主要的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同时，由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广大军民的发动，就使得抗日战争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这样，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与战略进攻等一套的东西都发生了。随着战争的长期性，也就带来了战争的残酷性。这样，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坚持唯物论，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才能认识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才能提出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的战略方针，引导抗日战争走向胜利。

二、指挥员的主动权来源于对客观情况的正确了解和对具体问题的妥善处理。

战争的主动权，就是军队的自由权。它是战争全局的重要关节，对于战争的胜利有决定性的意义。古今中外的一切战争，其敌我双方都力争在战场、战地、战区以至整个战争中取得主动权。这是因为谁取得了主动权，谁就有了赢得战争胜利的把握；谁要是丧失了主动权，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谁就有被消灭或被打败的危险。

那么，怎样才能取得战争的主动权呢？毛泽东同志说：“主动权不是任何天才家所固有的，只是聪明的领导者从虚心研究和正确地估计客观情况，正确地处置军事政治行动所产生的东西。”为了争取主动权，就要对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有正确的了解，并对此采取正确的行动。不然，对自己的情况若明若暗，或估计过高，或丧失信心；对敌人情况或一无所知，或知之不多；其结果要么由于轻敌而冒险蛮干，要么被敌人气势汹汹所吓倒。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会有主动权可言，只会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

由此可见，要想争取到或保持住战争的主动权，一定要坚持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从战争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彼此的优势作出具体分析，以己之长，攻敌之短，争取主动，战而胜之。

三、敌我双方的强弱优劣都是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

抗日战争中的游击队面对着强大的敌人。在这种敌强我弱的状态下，如何取得战争的胜利，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熟练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对敌我双方的复杂情况进行了科学地分析，指出敌我双方的强弱优劣都不是绝对不变的；敌之强可以为其他不利条件所减杀；我之弱也可以为其他条件所补充；敌强我弱，无不在一定条件下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因为强与弱、优与劣既是互相排斥，又是相互依存和相互渗透的，即强中有弱，弱中有强。日寇是强国，但是敌军虽强而数量不足，加之敌人处于异国作战，必然引起被侵略国家全民族的反抗，以及敌人指挥上的失误，构成它的三大弱点。我们是弱国，但我军虽弱而数量甚多，加之有人民群众的拥护，以及正确的指

挥，游击队可以捉住敌人的弱点，变自己的劣势为优势。首先欺他兵力不足，放手扩大游击区；其次欺他是异民族，放手争取千百万人民的拥护；第三欺他指挥笨拙，放手发挥自己的聪明。就是说，我们的弱中也有强，弱也能转化为强。可见，只要坚持运用辩证的观点去观察和处理问题，从劣势中看到优势的因素，从困难中看到胜利的希望，积极努力创造条件，变弱为强，化劣势为优势，就会克服困难，取得胜利。

四、正确处理集中与分散的关系，实行战略统一指挥下的自主权。

集中与分散的关系是一个带有战略性的指挥关系问题。正确解决这个问题，是游击战争顺利发展的条件之一。由于游击队是低级的武装组织和有分散行动的特性，不容许高度的集中主义，然而游击战争不是不要任何的集中指挥。游击战争的指挥原则，一方面反对绝对的集中主义，同时又反对绝对的分散主义，应该是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这就是党对于整个游击战争的部署，各个战区里面游击战和正规战的配合行动，以及每个游击区或根据地里面对于全区抗日武装的统一指挥，凡关于战略性质的事项，下级必须报告上级，并接受上级的指导；至于战役战斗的具体部署，各个游击队可以按照随时随地的具体情况去做。集中与分散是对立的统一，是有主次之分的。一般的方针集中于上级，具体行动按照具体情况实施之，下级有独立自主之权。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关于认真研究客观情况，从实际出发，规定战略方针，找出解决具体问题的有效方法，争取主动权的思想；关于以弱胜强，扬长避短，促进劣势转化为优势，困难转化为顺利，乃至失败转化为胜利的辩证方法，在四化建设的实践中都必须自觉应用。当前我们要特别注意处理好集中和分散、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树立全局观念，做到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

(狄凤山)

《论持久战》哲学思想简介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三八年五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讲演。当时，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十个月。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消极片面的抗战方针，使日寇得以长驱直入，很快就侵占了华北各省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并把战线推到了华中、华南，进而准备围攻武汉和广州。与此同时，我党实行全面抗战，开展游击战争，不断给日寇以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内部是一片混乱。抗战以来所流行的“亡国论”和“速胜论”又抬头了，有的叫嚷“再战必亡”，有的患急性病，幻想依靠外援取得胜利。在共产党内部也有“速胜论”的反映，有些人被一两个胜仗冲昏了头脑，存在一种盲目乐观的轻敌思想，幻想跟着国民党打大仗迅速取胜。这些情况给人们思想造成了很大的混乱。抗战能否胜利？怎样争取胜利？是持久战还是速决战？为了回答这一系列问题，坚定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指明争取胜利的道路，毛泽东同志及时发表了《论持久战》。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同志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客观地、全面地考察了中日战争的基本特点，分析了战争的性质和取得胜利的条件，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及其认识论根源，科学地预见了战争的进程和趋势，提出了一整套正确指导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战役战术原则，对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是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光辉典范。

一、用客观的全面的观点考察中日战争，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

毛泽东同志从认识论的高度，提出了考察战争的科学方法。中日战争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物，如何看待和分析这个事物，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一是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即“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一是“亡国论”者和“速胜论”者的方法，即主观和片面的方法，毛泽东同志称之为“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所谓客观的全面的观点，就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认真研究和把握客观事物的各个方面的联系，从中找出其固有的规律性，做为行动的向导。毛泽东同志运用这个方法，首先从总体上对中日战争进行了考察，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从而为从总体上把握中日战争的客观规律，为认识和解决战争中的全部问题提供了总根据。其次，具体分析了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的基本特点及其相互联系。毛泽东同志把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概括为四条，即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毛泽东同志在作了这样的分析之后，又把这些对立的基本特点联系起来，进行综合性的思索。从第一个互相对立的特点中得出了持久战的结论，指明了抗日战争的持久性是抗日战争发展的最根本规律。从后三个互相对立的特点中，则看到了最后胜利必然属于中国。为日本必败、中国必胜提供了客观依据。第三，具体地分析了战争发展的过程和趋势，预测到抗日战争必经三个发展阶段：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战略相持阶段；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阶段。在三个阶段中，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必然是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最后必然是中国胜利，日本失败。

二、阐明了在战争中尊重客观规律性和发扬自觉能动性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同志深刻地阐述了在战争中尊重客观规律性和发扬自觉能动性的相互关系，指出战争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客观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还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从而说明了在战争中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扬自觉的能动性二者是辩证的统一，互为条件，缺一不可。

在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中，毛泽东同志在尊重客观规律性的基础上，十分重视发扬人的自觉能动性。他把人的自觉的能动性概括为是人类所特有的自觉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他认为，这种自觉能动性的作用在战争中表现得尤为强烈。他说：“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性的因素。客观因素决定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

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为了避免犯唯心论和机械论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在战争中发扬人的自觉能动性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首先，发扬自觉的能动性必须以客观条件为依据，认识战争客观规律，做到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其次，发扬自觉的能动性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战争中人与武器的辩证关系，反对唯武器论的机械论。第三，发扬自觉的能动性必须充分发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自觉能动性，实行人民战争，不能只发扬少数指挥员的主观指导作用。一句话，是要充分发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

三、深刻地论述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中的辩证法。

根据第一、二次国内战争的经验和抗日战争以来的实践，毛泽东同志极其深刻地阐明了具有丰富辩证法思想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的理论。

依据中日战争的特点，毛泽东同志生动地揭示了中日之间犬牙交错的战争状态，分析了内线与外线、有后方与无后方、包围与反包围、大块与小块等等之间的互相对立、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奇异状态。提出了战略防御中的战役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战斗的外线作战的方针。毛泽东同志还具体地论述了战争过程中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之间的对立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论述了兵力运用上的集中与分散之间、战争指挥上的集中与分散之间、战争的计划性与流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论述了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各自的特点、作用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论述了歼灭战与消耗战之间的对立统一，等等。

毛泽东同志对战略战术中一系列范畴的辩证分析，是抗日战争中活生生的客观矛盾运动的反映，是对立面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辩证法思想在指导战争过程中的创造性的运用，它进一步丰富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学说。

四、深刻地阐述了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

毛泽东同志在阐述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理论时，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论断。他认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他把动员全国的老百姓看作是“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为此，他十分重视对人民群众作政治动员。只要进行经常的、广泛的政治动员，就“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抗日战争的全部进程，雄辩地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依靠和发动广大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是光彩夺目的。

我国现在又是处在一个由乱到治、由穷到富，大变化、大发展的历史时期。我们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运用客观的全面的观点考察中日战争，得出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结论，对于澄清人们在四化建设中出现的种种担心和疑虑，克服速胜幻想和悲观失望的倾向，提高和增强全国人民实现四化的信心，是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的。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发扬人的自觉能动性的论述，人民战争战略战术辩证法的论述，依靠和发动广大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论述，可以清除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从实际出发，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既尊重客观规律又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夺取现代化建设的胜利。

(张炳钧)

《战争和战略问题》哲学思想简介

《战争和战略问题》，是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这篇著作是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指导我们党建设军队、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在我们党的倡导下，国共两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对这种新的情况，党内犯右倾错误的同志忘记国民党反动派反民主反人民的本质，否认我党在统一战线中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则“一切服从蒋介石”；反对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主张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搞合法运动；反对我军实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主张配合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如果照这种思想去办，其结果必然是把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不能在日本占领地扩大解放区和壮大人民军队，最终葬送革命。为了纠正右倾错误思想，使全党更加明确了解战争和战略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正确方针，毛泽东同志在这篇著作中，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深刻地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战争和战略问题，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

一、必须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普遍原则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原则。因为战争是私有制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只要私有制还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只有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阶级，战争才能消灭。无产阶级革命是要从握有强大武装力量的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是不可能不经过战争的。离开革命战争，就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这是阶级社会的矛盾的共性，是阶级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所以，不论外国还是中国，无产阶级进行革命都必须坚持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的普遍原则。幻想“一切服从蒋介石”，搞合法斗争，只能失败，决无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的反动阶级手中夺取政权，进而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不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是根本不可能的。

毛泽东同志又明确地指出，由于各国的实际情况不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执行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的普遍原则的时候，必须从本国的国情出发，根据本国的特点，活用普遍原则。在资本主义各国，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有议会可以利用。基于这些特点，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积蓄力量，准备最后用武装斗争推翻资本主义。中国的特点是：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没有议会可以利用，没有组织工人罢工的合法权利。基于这些特点，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合法斗争，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